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92

《三侠五义》

鲁德才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6
2:92



本书是作者研究《三侠五义》的多年成果，并吸纳了海内外学者的有益见解。虽为通俗性读物，但作者采用形态比较的方法，阐述了原作者石玉昆的生平事迹，《三侠五义》版本的流变；由史传中的包公到民间传说、宋话本、元杂剧、明代说唱词话、小说的包公演义、龙图公案，直到清代《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由古游侠到《三侠五义》侠的演变，对小说中几个重点人物欧阳春、展昭、白玉堂、蒋平、智化、艾虎的性格特点，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以及《三侠五义》对后世新旧派武侠小说的影响都做了简要确切的论证，其中有些文献资料较少为人所知。此书无论是对初学者或专业研究者，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ISBN 7-5313-2047-9



9 787531 320470 >

ISBN 7-5313-2047-9/1 · 1785 定价：6.00元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92

《三侠五义》

鲁德才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侠五义》/鲁德才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2047-9

I. 三… II. 鲁… III. 侠义小说—文学评论—中国—
清代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707 号

《三侠五义》

鲁德才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7 千字 印张: 3¼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爱群

责任校对: 侯俊华

王维良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王颖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047-9/I·1785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00 册): 600.00 元

目 录

一、石玉昆与“石派书”/1

石玉昆的生平——石玉昆的说唱技巧与声望——石玉昆的著述——记录整理说唱本《包公案》的是谁——尚存石派书几种版本的比较——由说唱本《包公案》到散文本《龙图耳录》——《龙图耳录》的几种版本——由《龙图耳录》到《三侠五义》(《忠烈侠义传》)到《七侠五义》

二、包拯的主要事迹与包公精神/16

包拯的生平事迹与性格——箭垛式的人物——社会与大众的心理需求——宋话本与宋元杂剧戏文的包公及其精神——元杂剧已提示包公有钢铡并能日断阳间晚理阴司——明代成化说唱词话包公案——包公被神化为文曲星下凡——《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

三、侠、侠的意识与《三侠五义》的侠/41

秦汉的游侠、刺客与豪侠——魏晋六朝时侠的分流——唐代的豪侠——宋元明侠的世俗化与雌化——侠的两难境地——《三侠五义》的侠意识——由游侠到皇家卫士的大侠展昭

——游侠欧阳春

四、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57

白话小说的发展系统——宋元公案小说的类型——明代公案侠义的形态——《包公判百家公案》与《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的蓝本不是明末清初刊本《龙图公案》——公案与侠义合与分——《三侠五义》怎样处置公案与行侠主题——连环体的结构——夹叙夹评的叙事形式——智化盗珍珠御冠的细节描写——多面性格化的白玉堂——诙谐潇洒的蒋平——机灵鬼小侠艾虎

五、实开近日一切侠义小说之门/95

民国时期“南向北赵”与“北派五大家”——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创作特点——北派武侠小说家赵焕亭的笔法接近于前人公案小说的说书语气——张扬侠义精神——《三侠五义》人物性格塑造与打斗技巧为后代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参照——超凡入神的新派武侠小说的武功打斗

一、石玉昆与“石派书”

《三侠五义》是清文人据清代说唱艺术家石玉昆的说唱本整理而成的。

石玉昆，字振之，北京人，生卒年至今不能确切断定，只知于清道光年间，以唱西城调子弟书著称于世，后人称为“石派书”、“石韵书”，尊石玉昆为“石先生”、“石三爷”。

石玉昆的演唱技巧的确很高，唱腔也与众不同，金梯云在抄本子弟书《叹石玉昆》中说：“则见他拨动了三弦如施号令，满堂中万籁俱静，鸦雀无闻。但显他指法玲珑，嗓音嘹亮，形容儿潇洒，字句儿清新。众诸公一句一夸、一字一赞，众心同悦，众口同音。”另一本子弟书《平昆论》更称赞石氏曰：“高抬身价本超群，压倒江河无业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歌唇。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是谁拜赠‘先生’号？直比谈经绛帐人。”（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文学季刊》1934年一卷二期）

从当时说书艺人的评论中，也可看出石玉昆说书情况和声望。笔者有幸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双红堂藏六本石派书中(以下简称双红堂本),就发现了几条极有价值的材料。先看《全本天齐庙断后》中说书人的自述:“愚下所说的这一部《龙图公案》,通是胡诌,怎么能一天一天的书馆里说书呢?列位自想,包公有多少真事?不过是没枝儿添枝儿,没叶儿添叶儿就是了。玉昆三爷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呢,问问他,哪一句不是胡诌呢?只是诌出理来就是好书。”在叙述草州桥包公坐轿的轿杆折断,有人认为不必因为马不前行就疑影疑行,说话人又评论道:“这话说别的方镇大员功臣良相使得,说文正公这话使不得。谁要说是使得,玉昆石三爷他就先不依咧,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辈子的(鲁按:当指说了一辈子包公案),有什么不知道呢?”《全本南清宫庆寿》中说书人的一段插叙,更介绍了石玉昆在曲艺界的声望:“小比大古今一理,时字是了不得的。就拿玉昆石三爷他说吧,怎么就该说不过他?他如今是不出来咧。他到那个书馆儿,一天只说三回书就串好了几十吊钱,如今名动九城,谁不知道石三爷呢?我如今说书,一天才不过一两吊钱,这岔到那儿去咧!”又“玉昆石三爷是的,在班房儿里说起《龙图公案》来咧。他说是哪一段呢?乃是接演前文陈州放粮的那段故事。好容易刚说完了铡安乐侯咧,那些个人全都点头咂嘴,不住的赞美。”

说书人的插叙,无疑是告诉人们:一、石玉昆讲说的书目为《包公案》或《龙图公案》;二、《龙图

公案》是由石玉昆虚构编织的；三、石玉昆的说唱名动京城，执书场的牛耳；四、石玉昆已退出说书场。

我们不能确切考定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藏石派书的抄录年代，因而也不能确认石玉昆退出书坛的年代。但富察贵庆诗集《知了斋诗钞》内有一首咏石玉昆的七言律诗及序，其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二十年”，其诗句也云：“一笑史从何处说，廿年人得几回闻。”（转引自吴英华、吴绍英《有关〈三侠五义〉作者一首可贵的诗》，载1961年8月29日《天津日报》）再参照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单弦之祖也。贵月山尚书庆尝以柳敬亭比之。”贵月山即贵庆，字云西，号月山，道光十六年（1836）七月由刑部左侍郎迁礼部尚书。今人阿英先生在《关于石玉昆》文中说他新得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的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其中就有一篇《石玉昆》，所记时间恰好与石玉昆成名时间大致相符。即如果一般艺人成名多在二十几岁左右，那么石玉昆鼎擅书场二十年，当在四十岁左右，也就是道光初年至道光二十五年之间，他的生年也不会晚于嘉庆五年（参看于盛亭《石玉昆及其著述成书》，《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二期）。至于石玉昆何以过早地离开书场，不得而知。《咏石玉昆诗》首两句云：“攀条轶事吊斜曛，绝技风流又属君”，所谓“风流”，再联系最后两句诗：“为底

朱门无履迹，曳裙应怪太纷纷”的“曳裙”，似乎与男女风流之事有关；或如贵庆诗序中说其“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不愿做达官贵人的弄臣；但也有人说“石玉昆原是‘礼王’说书人”（金受申《老书馆见闻琐记》，1959年8月至11月《曲艺》）。总之，在清代，艺人一旦成名，必然要随时等待王公贵臣的应招，王公也视艺人为狎客弄臣；反之，孤傲而不“识相”者，常遭到种种无名的攻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

关于石玉昆存世的著述，子弟书《石玉昆》云曾“编来宋代包公案”，大约就是今人刘家复、李家瑞编《中国俗曲总目稿》、傅惜华编《北京传统曲艺总录》著录的《小包村》、《九头案》、《救主》、《召见展雄飞》、《审郭槐》等包公案故事五十余种，另外还有《风波亭》、《青石山》等数种。原藏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惜已焚毁无存。这些本子被前辈学者认定为石玉昆的说唱底本，但由谁来记录整理的却没有明确证明（参见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1934年版《文学季刊》，一卷二期）。

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提供了一点线索：（聚珍堂）“所印之包公案（小字注：即《三侠五义》）最有名。因此书本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小字注：有祥乐亭、文治庵二公在内），每月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其中人物，各有赞语（小字注：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

也。”祥乐亭的生平事迹不详，而文治庵即文良，与《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为同门兄弟。崇彝在《杂记》中又说：“咸丰、同治间，京师藏书之家，以文治庵良、锡厚庵夔二公最负时名。文官四川道员，其家藏书富而精，最讲版本，丛书又备，故后为其裔孙某斥卖殆尽。”文良既有藏书之癖，又对小说有浓厚的兴趣，参与记录整理《包公案》是可能的（参见于盛亭《石玉昆及其著述成书》）。

如果文良、文康、文硕均系崇彝祖母的兄弟行，其说较可信的话，那么乐善堂抄卖唱本《书目序》中说：“本堂抄卖……石派带赞新书，授自名人校正。……本堂数年来精工采访，遂得数纸，幸与石书相合。”（转引自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从情节逻辑而言，文良等人记录整理了石玉昆所传的《包公案》，形成各自独立的段子，然后乐善堂、百本堂及别野堂等利用文良等人的校正本，“按段抄卖”，或“要者定写”，似乎符合操作程序，然而参与校正的“名人”可能是文良等人，也可能指别的某人。

既然是乐善堂本堂抄卖，就不只抄卖几本，肯定有许多本子流入民间。前者笔者提到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藏有两种石派书抄本：石韵书七本与《龙图公案》唱本四十一部，毫无疑问，这是当今仅存的几个本子。

日本藏石派书七种抄本为：《全本报主盘盒打御》、《全本小包村》、《全本侧庞坤》、《全本天齐庙

断后》、《全本南清宫庆寿》、《全本三审郭槐》、《全本青石山》。每本唱词都是三字句居多，应是石派书的特点。本子的抄录年代都不能确指，但系石派书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揣测说书人讲说中一再提及“石三爷”的声口，不像是石氏的嫡传弟子，其唱本也非是石玉昆的祖本，仍系某个堂的抄卖本。可《全本青石山》第二页有一方印，中间写“百本张”，上眉写“世”字，底栏写一“传”字，右写“言无二价”，左写“童叟无欺”，显系张抄本。

《龙图公案》说唱本共四十一部，每部封面均题《龙图公案》，第一部首篇说书人说：“此书几句残歌念罢，开一段三侠五义、忠臣佞党、豪强恶霸的故事。”这大约是有的抄本既称《龙图公案》，又叫做《三侠五义》的原因。第二十一部、第四十一部封面右侧题“茂斋”二字，第二十五部最后一页又题“壬戌孟春，是日也，王某笔意。”可知录者为王茂斋，壬戌当是同治元年（1862—1863）。第四十一部封底更明确注有抄录时间：“咸丰十年望日起，同治元年朔日止。”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较接近石玉昆说唱活跃时期的本子。

第一部从真宗登基，年四十五岁膝下无儿写起，到第四十一部欧阳春巧定社火会，元宵节闹花灯，诨拿马强，相当于《龙图耳录》与《三侠五义》的第七十五回，显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过录本。全书不标回目，却以七言诗四首或八首头行（引场词）开篇，代以回目，并具有概括全书内容的作用。每部

分的结束均写有“且听下回分解”，每部分起始均以“话说”拎起下文。正文开始是叙述性的引子，然后转入唱文，一段唱词，一段叙述，韵散交错。

以石韵书与《龙图公案》唱本同《龙图耳录》第一回包拯出世为例，让我们看看三个本子的异同。石韵书《全本小包村》：

江南庐州合肥县，离城三里有一庄名叫包家庄，庄中一住乡人，姓包名怀，众乡民都称包家庄三字之名。这日包怀邀请邻舍合村大小老幼，大家商议，将包家庄改为小包村，言其不敢自大。包氏门中作德三世，广行善事，远近的众乡亲有求必允，故此人都称为善人；又因家财万贯，骡马成群，牛羊满圈，良田万顷，又称包百万，家财大富就以员外称之。包员外之妻周氏安人，年纪五十二岁，员外五十三岁。员外并无闺门之女，只有二位官人。因小包村前有一座锦屏山，指山为唤作包山，因庄后有一带河，名曰玉带河，二官人指海之名，名唤包海。包山大官人娶妻王氏，二官人娶妻李氏。王氏为人心田良善实诚，李氏嫉妒，心地不良。老安人身有贵恙。……

《龙图公案》唱本：

在庐州小包村有一位员外姓包名如梅，

安人赵氏，所生二子长名包忠，次名包全，俱是完过了婚。忽然间老安人身怀六甲，到有十三个月分娩。这日包员外半夜三更偶得一梦……

《龙图耳录》：

且说江南庐州府河(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村中有个包员外，名怀，家道巨富，良田千顷，为人乐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皆称为“包百万”。包怀原是谨慎之人，既是有“百万”之称，惟恐担当不起，他又难以拦阻众人，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小包村，以为自己谦和，不敢当的意思。就此一事，可见他为人再不是妄自尊大，欺压良善那一类的人了。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在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长名包山，娶妻周氏，生了一子，才经满月，次子包海，娶妻李氏，尚无儿女。他两个虽是同胞所生，禀性却不相同：大爷包山为人忠厚老成，妻王氏也贤德有余的；二爷包海为人尖酸刻薄，偏偏的妻子李氏又是心地不端的。……不意院君周老安人年纪已过四旬，忽然怀孕在身……

三个本子情节架构均属石派系统，但其间仍有文字繁简之别。这是由于说书人同听众直接交

太平天子太平春
太平江山太平業
太平豐年太平路
太平處：太平世
太平歌舞太平音
太平景象太平佳
太平世界太平民
太平歡興太平人

殘歌念罷開演一部三抄錄通俗三俠五義龍岳公案却說大
宋真宗天子在位登基二十餘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就只是
赦法太重上天震怒罰他絕嗣因此無子守缺的太子象且調
奏天子自知已過改去殺法廣行仁慈至誠修善保子壽僧數

说唱《包公案》，清蒙古车王府藏本，今存北京首都图书馆

流,不可避免地具有许多即兴或半即兴的表演,随时穿插敷衍,因此说书人以有声语言作为表现理智与感情内容的第一性符号,比起书面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感情信息量要无可比拟得多。没有一个博闻强记的高手,能够只字不漏地记下讲唱的全文,也没有一个整理者不加添自己的主观描述,这就造成了几个本子基本情节可以相似,而夹叙夹评上绝对不相一致。即便是今存国内的清蒙古车王府藏《三侠五义》、《包公案》讲唱本,同上述海外本,同《龙图耳录》散文本较比,也照样有很大差异,只有石韵书讲唱本叙述部分较接近《龙图耳录》。

这样看来,石派书记录本之后有各个堂抄卖本,也有私家抄本流传于民间。

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讲唱本并不是后来《三侠五义》的惟一源头,虽然它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其实推动唱本转换为小说的是《龙图耳录》。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六《明清小说部乙》中说:“诸本多无跋。余藏本第十二回末有抄书人自记一行云:‘此书于此毕矣。惜乎后文未能听记。’知此书乃听《龙图公案》笔受之本。听而录之,故曰《龙图耳录》。……玉昆说唱《龙图耳录》,今犹有传抄足本,唱词甚多,此《耳录》全书尽是白文,无唱词,盖记录时略之。”

值得注意的是,无名氏抄书人写下的“惜后文未能听记”的“听记”,也就是说《龙图耳录》是他听

而录之，而非是在某种唱本或成稿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但有的学者依据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卷首的说明：“《龙图耳录》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续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妖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奥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如果推断白文《龙图耳录》并非是直接听书时的记录，而是在某种“成稿”的基础上删定改写成书的，这个“成稿”仍然是指文良等人的记录本或过录稿，那么，由记录本改写成白文《龙图耳录》的，仍是文良等根据各自的记录稿分头整理加工，形成了《龙图耳录》的不同抄本。（参见于盛庭《石玉昆及其著述成书》）

今已知《龙图耳录》抄录本有孙楷第藏本，已佚；汪原放藏谢蓝斋抄本；傅惜华藏同治六年抄本，傅先生仙游后，遗本不知下落，如今只存谢本。谢蓝斋本可能是孙楷第藏本的过录本。据傅惜华先生生前用所藏同治六年抄本与谢蓝斋抄本勘比，谢本与同治本的内容情节基本一致；谢本的回目较整齐，但有错别字并有与内容脱节不符之处。同治本回目显然对仗不工，字数也参差不齐，但较切合内容；谢本正文简略多错别字，而同治本正文较繁，描写也较细腻生动。

人们评价石玉昆创作的《包公案》，常把视点投向小说《三侠五义》，而忽略了《龙图耳录》的价值。其实由石玉昆讲唱的《龙图公案》转向书面小